

白居易诗赏读

张黔
吕静平
著

李永田 董希平◎主编

唐宋名家诗词赏读

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

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
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
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
线装书局

白居易诗赏读

张 黔 吕静平 著



唐宋名家诗词赏读

李永田 董希平 主编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居易诗赏读 / 张黔, 吕静平著. —北京: 线装书局, 2007.2
(唐宋名家诗词赏读)

ISBN 978-7-80106-455-4

I. 白… II. ①张… ②吕… III. 白居易 (772-846) —唐诗—
文学欣赏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1006 号

责任编辑: 于建平

封面设计: 亿点印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天则图书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香河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59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0.00 元 (全套十二册)



唐宋名家诗词赏读

主编：李永田 董希平

副主编：胡璟 赵亚丽 贺颖莉

《李白诗赏读》	纪 准
《杜甫诗赏读》	吕明涛
《白居易诗赏读》	张 黔 吕静平
《李商隐诗赏读》	邓 丹 陈芝国
《杜牧诗赏读》	陈 光
《李煜词赏读》	周仕慧
《柳永词赏读》	刘占召 张海凤
《苏轼词赏读》	沈耀峰 陆爱英
《李清照词赏读》	徐建委 刘 峥
《辛弃疾词赏读》	王明辉 王铭丽
《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》	李玉珍 王景明
《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》	李玉珍





序 言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。

对于传统的中国精英阶层，诗词创作是他们自识字就开始的人生必修课。他们自然而然地浸润其中，如同日常饮食。

古来圣贤无不善于此道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，既蕴涵着前贤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也浓缩着先人深邃的人生体悟：“何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”，显示出晋人刘琨对于更高层次人生境界的向往；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，透露出唐人李白对于人生流程奥秘的领会；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是宋人苏轼对于丰厚学识的自信；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是清人纳兰性德对于世情多变的无奈……很多诗词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、诗人独特的遭际下写就的，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历史背景、诗人的遭遇和情感，有很多还涉及更久远的历史典故、神话传说等。因而在诗词中，历史鲜活了起来，诗人的人生鲜活了起来。古典诗词以其深刻的思想、精练的语言往往成为孩童习字诵读的传统教材，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也占有相当的比重。

诗词是华美的，以致历经久远，仍被我们反复玩味，这也是诗

词的重要价值之一。而造成这种美的因素很多，其中诗人的真诚占了重要的份额。他们浓缩了深邃的体悟，用一生的执著写就了这美的诗章，诗人的生命之花绽放其中，可谓至诚。唯其如此，才流传千载而不昧，时时触动我们的心弦。

一卷古诗词在手，即可与千载之上的古人进行跨时空的心灵的沟通和对话，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，体味着“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”的境界。这种浸润心灵的阅读，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，应该也算得上一种“精神的化妆”，或者“心灵的美容”吧。这在“快餐文化”大行其道的今天，更有其特殊的意义。

本丛书分别从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杜牧、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李清照、辛弃疾共十位唐宋诗词名家的作品中，遴选其优秀者以成十部专辑。另外广泛撷取唐宋诗词名家精华之篇汇成两本合辑，一为《唐代诗人名家名作赏读》，一为《唐宋词人名家名作赏读》，一并呈献给读者。十位大家在唐宋两代诗词领域中，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代表性，再加上两本合辑尽搜名家名作，故本丛书足具唐宋诗词之大致面貌，观止矣。

本丛书特邀各高校学有专精的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的学者，精心编选。其中的注释力求详备准确，赏析文字力求流畅感人，雅俗共赏，其字里行间也渗透着编著者自己的研读心得和人生体验。因此，个中偏颇之见难以避免，所谓“见仁见智”是也。我们的初衷之一也正是在于抛砖引玉。

是为序。

董希平

白居易其人其诗



白居易（772～846）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与李白、杜甫并称唐诗三大家，代表着唐诗的最高成就，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诗人的祖先系太原人，后迁至下邳，他出生于河南新郑。祖父白锬，十七岁就明经及第，工诗，官做得不大，但官声很好。父季庚，亦是明经出身，先后为彭城令、襄州别驾、徐州别驾等官。诗人的母亲是季庚的外甥女，这可能与白氏祖先是胡人因而风俗迥异于当时的中原士族有关。诗人有兄弟四人，长名幼文，做过小官；幼名金刚奴，早夭。二弟行简，与居易友爱，且工诗文，举进士，兄弟曾同朝为官，传为一时佳话，但不幸比居易早死二十年。诗人结婚很晚，三十七岁才与杨颖士堂妹结婚，生有一些子女，但大多没有长大成人，因而一生无子，死时以侄景受为后。

诗人流传下来近三千首诗，其数量在唐代诗人中无疑是最多的，其原因有四：一是勤奋，二是高寿，三是生活道路比较平坦，四是注意及时收集整理自己的作品。诗人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：讽喻诗、闲适诗、感伤诗、杂律诗。讽喻诗约有一百七十余首，以“美刺比兴”、“因事立题”、“意激而言质”为特点，数量虽然不占其诗作的主体，但却是诗人生前最看重的一类，《秦中吟》（十首）、《新乐府》

(五十首)就是其中著名的作品。闲适诗数量最多,也有一些名篇佳作,以“知足保和,吟咏情性”为特点,亦为诗人所看重,但“思淡而词迂”,多数内容无足可观。感伤诗以物感情动、随感而咏为特点,以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最为著名,这类诗代表了白诗的最高成就,在当时就已经名扬天下了,但诗人对此类诗并不特别看重。杂律诗也有相当数量,并为读者所欣赏,包括山水田园、农村题材的诗歌。白诗的重大影响与他相对先进的诗歌理论密切相关,他认为:“诗者,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”,又说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(《与元九书》)这种诗歌理论,自觉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,是现实主义的。

白诗在当时就产生了重大影响,诗人的好友元稹在其《白氏长庆集序》中曾提到:“禁省、观寺、邮候、情壁之上无不书(白诗);王公、妾妇、牛童、马走之口无不道(白诗)……自篇章以来,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。”民间甚至流传着歌女以能歌唱白诗之《长恨歌》而自高身价之事。

诗歌从根本上是作者人生道路与人生经验的反映,白诗也不例外。下面我们将诗人的人生道路分为五个阶段,并结合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其诗歌艺术的特色。

从游学到初为闲散小官时期 (772~806)

诗人自述自己生有夙慧,六七个月时就能默识“之”、“无”二字,屡试不爽;五六岁时就学作诗;到九岁居然就能掌握诗歌用韵的规律了。建中三年,诗人十一岁,随父亲到徐州别驾任所,全家于符离寄住下来。建中四年,两河用兵,避难于越中。贞元二年,仍在江南,始知有进士,苦读诗书。这年诗人十五岁,流传有《江南送北客,因凭寄徐州兄弟书》诗,显得少年老成。时游走于苏杭一带,对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风物之美印象深刻,为诗人后来主动要求到苏杭任刺史打下基础。贞元三年,诗人十六岁,作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以此诗拜谒当时居于苏州的名士顾况,顾况读了其诗后,大为赞赏:“吾谓

斯文遂绝，今复得子矣。”（《唐摭言》）此诗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两句老辣劲利，格调古雅，意境开阔，实为难得之佳作。第二年，从父亲到衢州，有《王昭君》二首，显示出诗人即事名篇的能力。贞元十年，诗人二十三岁，是年诗人留有《游襄阳怀孟浩然》，此诗表达了诗人对前辈的敬仰之情，也说明了诗人内心对山水田园诗人的生活方式及诗歌风格的认同。这年诗人父亲去世，使诗人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，全家只能靠任浮梁主簿的哥哥幼文的俸禄生活，家亦由符离迁到了洛阳。诗人是年作有《将之饶州江浦夜泊》，其中有“明月满深浦，愁人卧孤舟”、“苦乏衣食资，远为江海游”等句，说明诗人此时生活是非常窘迫的。

贞元十五年秋，诗人应试于宣州，为宣徽观察使崔衍所供，往长安应试。是年作有《自河南经乱，关内阻饥，兄弟离散，各在一处。因望月有感，聊书所怀，寄上浮梁大兄、于潜七兄、乌江十五兄，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》诗，其中“一夜乡心五处同”颇为人所传诵。贞元十六年，在长安参加进士试，及第。贞元十七年，诗人居洛阳，作有《叹发落》、《花下自劝酒》、《及第后归觐，留别诸同年》、《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》等诗，刚刚进士及第的诗人显得有些浮躁和矫情，既有“春风得意”之感，也有归隐青山之思，显示出刚接近官场的诗人的幼稚与多虑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年诗人所作诗篇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对山水田园的亲近之情的，这也说明诗人日后半官半隐的生活及对自然山水的亲近由来已久。贞元十八年，诗人应试书判拔萃科，结识元稹，二人从此成为一生知己。第二年初，考试结果出来，元、白二人同登第。这年诗人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，从此正式踏上了仕途。是年诗人三十二岁，作有《思归》、《留别吴七正字》、《早春独游曲江》等诗。

贞元二十年，诗人将家由秦中迁到下邳县义津乡金氏村，作有《哭刘敦质》、《下邳庄南桃花》等诗，诗人已有对自己政治前途未卜，怕被最高统治阶层遗忘的担忧。德宗贞元二十一年，亦即顺宗永贞元年，诗人寓居长安永崇里华阳观，作有《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

饮》、《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》、《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》、《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，因宿玩月》等诗，尽赏长安美景。因当时宰相韦执宜等一班人的获罪，诗人原有的政治热情受到了打击，看到了“昨日延英对，今日崖州去。由来君臣间，宠辱在朝暮”（《寄隐者》）的事实，因而想到“青青东郊草，中有归山路。归去卧云人，谋身计非误”。这说明，早在长安为官时期，诗人就有了隐居思想。

宪宗元和元年，诗人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，登第，授周至尉。并于是年七月权摄昭应事。在周至与陈鸿、王质夫等友善。十二月，游仙游寺，作《长恨歌》，并有《赠元稹》、《招王质夫》、《新栽竹》、《权摄昭应，早秋书事，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》、《县西郊秋寄赠马造》等诗。到此为止，诗人还没有接近权力中心，远离政治斗争，因此此前的诗歌除个别作品外还没有直接涉及重大政治主题的。《长恨歌》是一个试图接近政治主题的诗歌，本意在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误国，但最终却写成了一曲爱情悲剧，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同情取代了对二人荒淫无度的批判，诗歌的多重主题使得此诗成为白诗中最具争议也最为成功的作品。《长恨歌》对李、杨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，可能与诗人自己曾有过一次刻骨铭心但却没有结果的爱情经历有关。《长恨歌》的讽喻效果虽然没有达到诗人的理想，但诗人写讽喻诗的势头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。

总体上看，这个时期诗人还处于成长与学习的阶段，虽然做了小官，但离政治斗争还很远。此时诗人的诗歌主题大体可分为四类：第一类是对自己生活与游历过的地方自然风光的欣赏，如《游襄阳怀孟浩然》、《早春独游曲江》、《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》、《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，因宿玩月》等；第二类是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描写，尤其是对自己的亲人与朋友的思念，如《将之饶州江浦夜泊》、《自河南经乱，关内阻饥，兄弟离散，各在一处。因望月有感，聊书所怀，寄上浮梁大兄、于潜七兄、乌江十五兄，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》、《权摄昭应，早秋书事，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》、《县西郊秋寄赠马造》；第三类是对自己的闲情与闲愁的抒发，如《叹发落》、《花下自劝酒》、《及第后

归觐，留别诸同年》、《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》、《思归》、《招王质夫》、《新栽竹》等；第四类是对即将踏上政治道路或自己政治前途的担忧，如《寄隐者》、《下邳庄南桃花》等，而像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、《长恨歌》则难以归入上述各类，它们更多的是天才俊发之作，逸出诗人常规的创作道路。

从为宫翰林学士到被贬江州之前： 讽喻诗时期（807～814）

随着诗人政治前途的上升，他的生活离政治也越来越近，作品与政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，他作品中的“讽喻诗”也主要产生于这一时期。

元和二年，诗人开始受到唐宪宗的赏识，这年秋天，由周至尉调到长安任进士考官；十一月五日，召入翰林，为翰林学士，虽然诗人已三十六岁，但还是可以说少年得志。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，资历较深的往往能由此登上宰相之位，而像诗人这样的年资，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历练机会。元和三年，诗人又被任命为左拾遗，可以上朝言事了。对于皇帝的知遇之恩，诗人很是感激，他想有一番作为，要以自己的一片忠心来报答这分恩情。而报答的方式，就是不断地向皇帝上奏章，陈述自己对国事的见解，而皇帝也确实听取了他的不少意见。元和五年，诗人由左拾遗晋升为京兆府户曹参军，仍充翰林学士，但这年他上的奏折被采用的不多，有被皇帝疏远的迹象。元和六年，诗人母亲陈氏夫人去世，按制，诗人要停官三年，为母服丧，居于下邳渭村，这就使得他与最高统治者的联系中断了。而在这三年的服丧期间，诗人过得相当艰难，经常要靠元稹接济才能勉强度日。三年服丧期满，诗人于元和九年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元和十年，诗人上疏请求缉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，被认为是越职言事，为当权者所不喜。又有妒忌诗人者诬言白母看花坠井而死，而诗人竟作《赏花》、《新井》诗，有伤名教，乃被奏贬为刺史，而更有人认为诗人不适宜担任一郡主官，于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。诗人与宪宗皇帝的政治

“蜜月”宣告结束。其实是有人蓄意陷害诗人，因为诗人的母亲系死于心疾，误坠坎井和诗人本身道德无关，况其诗集中并无《新井》诗（亦有人认为诗人曾作有《新井》诗，但是在其母去世之前所作，后来诗人在整理诗集时没有将此诗收入）。

自任翰林学士起到被贬江州司马之日止，诗人在政治上总体来说是得意的，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“达”。按照他所继承的儒家人生观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这段政治上的得意时期（尤其是服母丧之前），诗人寻求的是“兼济天下”，为天下人谋幸福。但在处理“兼济天下”与“独善其身”二者的关系上，诗人还没有找到一个较好的折中点，古代志士仁人的“一死谢君王”的壮举激励着诗人走向“兼济天下”这一极端，而没有注意“独善其身”，自我保护不够，终于被奸人所陷害。

与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政治理想相适应的是诗人在上陈奏章的同时，写了大量的讽喻诗，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儒家知识分子的正义感。讽喻诗的多数诗篇都作于此时，而最为诗人及有儒家倾向的读者所津津乐道的讽喻诗《新乐府》（五十首）、《秦中吟》（十首）、《和答诗》（十首）等均作于此时。这些诗针砭时弊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，反映出诗人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。这些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为诗人带来极大的声誉，但因为揭了统治阶级的伤疤，也为诗人招来了忌恨，这才是诗人蒙祸的根源。

在为母服丧期间，诗人也写作了一些农村生活题材的诗篇，如《观稼》、《秋游原上》、《效陶潜体诗》（十六首）、《村居苦寒》、《登村东古冢》等诗，这些诗有的抒发了对农民的同情，有的抒发了对前途的苦闷，有的则揭示了生活的窘困。与刚中进士那两年所作的诗不同，这些诗内容充实，无无病呻吟之嫌，而有切身的的生活经验和真挚的情感体验，让人看到诗人对陶渊明诗歌艺术风格的心摹手追。这些诗有的也具有“闲适”的特点，但与后来的闲适诗相比，这些诗更具有贫病之感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，而不像后来的闲适诗歌多咏身边琐事，有些像老人絮絮叨叨。

从江州到忠州：感伤诗时期（815～820）

元和十年（815），诗人被政敌赶出了京城，被贬谪到了江州，本来春风得意的他突遭此横祸，可谓心如死灰。这个时期他写作了大量的诗歌，其主题都不离一个“愁”字。

从离开长安之日起，诗人就不断地写自己的忧愁。当诗人经过襄阳时，写作了《寄微之》（三首），抒发了自己与元稹的同病相怜之感，经过武昌时，又作了《夜闻歌者》，写一个伤心之人对另一个忧伤之人的关心与同情，而由于身处逆境，在贬谪途中诗人感到的是长夜难明，而周围则是“逆风吹浪”，危机四伏（《舟中读元九诗》）。贬谪路上诗人没有同伴，深感孤独，以致一根随身“红藤杖”的不离不弃也让诗人感动：“交亲过浐别，车马到江回。唯有红藤杖，相随万里来。”（《红藤杖》）诗人并没有完全消沉，在对前辈诗人李白、杜甫的诗集阅读后他领悟到贫穷出诗人，现在自己所受到的苦难是天意：“天意君须会，人间要好诗。”（《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》）诗对于诗人生命的重要意义，不仅在于能泄导自己的愤懑之情，更在于它让诗人看到了自己存活于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，在逆境中也没有放弃一种社会责任，所以他的“穷则独善其身”思想并没有让自己完全失去对社会的关心，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种关心而已。

到了江州，诗人遇到了一个对自己比较友善和宽容的上司，这让诗人心情稍感宽慰，但被贬谪的痛苦仍然像紧箍咒一样不时让诗人难以平静，此时诗人显得特别脆弱，似乎所有东西都能让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命运。看到被冻伤的失群之雁，诗人想到的是“人鸟虽殊同是客，见此客鸟伤客人”（《放旅雁》）。在州城的庾楼上，他放眼远望，却想到了“三百年来庾楼上，曾经多少望乡人”（《庾楼晓望》）。即使看到落花，诗人也没有忘记与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：“漠漠纷纷不奈何，狂风急雨两相和。晚来怅望君知否？枝上稀疏地上多。”自己的飘零与落花的零落也有了一种同构关系。不仅如此，诗人自己还是“冲雨客”（《风雨寻李十一因题船上》）、“独眠人”（《寄蕲州簪

与元九因题六韵》)，而这种情感的最集中爆发，是写于元和十一年的《琵琶行》。诗中的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写出了多少人间辛酸，曾让多少人为之动容！

在这一集中爆发之后，诗人的情感又归于平静了，一方面因为他与道家、佛教思想更接近，从思想上找到了排解苦恼的途径，另一方面诗人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环境，有了游山玩水的对象，并有了一批新朋友。他曾探访过陶渊明的故居，也曾在自己官舍内修建水池，并多次在庐山游玩，最终在庐山修建了自己的草堂，而刘十九、智满、灵澈、郭虚舟等隐士、僧人、道士屡在其诗中出现，反映出诗人以佛老思想来寻找精神寄托的解脱之路。

但诗人毕竟不是真正的隐士，他仍会为“淮冠未平，诏停岁仗，愤然有感”，也仍然保持着与朝中一些重臣的联系，闻某人拜相，他会写诗祝贺，而朋友中有人又升官了，他也为之欢欣：“四十著绯军司马，男儿官职未蹉跎。”（《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，以诗贺之》）这说明诗人“兼济天下”之心未死，而“独善其身”之愿终成。他此时所受的煎熬其实正是使这二者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。

元和十四年春，诗人四十八岁，他离开了江州这个伤心地，被提升为忠州刺史，这对诗人来说无疑是一大好消息，这说明皇帝并未真正忘记他。其实从他与宪宗皇帝的交往来看，皇帝对他的不满也是因为他太过狂妄，而将其以一个借口外放也可以看作历练其个性的手段。到忠州任官虽然仍是贬谪之路的继续，但其意义已有很大不同。对于诗人来说，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，能否抓住这次机会，就看诗人是否能学会官场的规则。这次从江州到忠州，诗人与弟弟行简同行，兄弟二人反省了诗人过去的行为之道，调整了今后的人生策略：不再以“兼济天下”为首要原则，而是以“独善其身”为首要原则，但在此基础上不放弃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。诗人的傲气在这次贬谪中彻底收敛了，此后的人生之路也变得一帆风顺。

虽然在忠州诗人作诗仍会涉及“愁”这一主题，但其强度和频率显然都已经大为减弱了。与江州之行的诗歌相比，那种刻骨铭心的

“愁”滋味已经体会不到了。

诗人将《长恨歌》也列入“感伤诗”，但与贬谪五年中所作的感伤诗不同，《长恨歌》是为李、杨二人的爱情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而感伤，而贬谪五年中所作的感伤诗则是为自己的命运而感伤，在情感内涵上有很大不同，而在抒情手段上，《长恨歌》无疑更加精雕细刻，而这段时间所作则显得更为随意。

如果诗人的生命就此终结，则历史上的白居易与杜甫是非常接近的。而诗人随后的二十余年，使得他追随陶渊明的一面得到更全面的体现。

从杭州到苏州：山水诗时期（821~826）

忠州刺史当了不到两年，诗人就于元和十五年（820）回到了京城，先是任司门员外郎，年底任主客郎中、知制诰。第二年（穆宗长庆元年），诗人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按唐朝的惯例，这几个官衔都是比较有可能成为宰相人选的重要职位。由于诗人身居要位，且加上以前的贬谪之苦，诗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十多年前的斗争精神和批判精神，从而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。这段时间诗人创作应酬诗较多，偶有佳作，但不值得特别注意。

诗人艺术生命的一个新的转机来源于诗人主动请求外任杭州刺史。长庆二年七月诗人获此任命，并于十月到任。诗人到杭州任职后，并不只是一个游山玩水的闲散之官，相反，他“始筑堤捍钱塘湖，钟泄其水，溉田千顷。复浚李泌六井，民赖其汲”（《新唐书》第一百一十六卷），以至于三年后诗人离开杭州时“耆老遮归路，壶浆满别筵”（《别州民》），而西湖山水之美给诗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诗人为此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。

还是在离开京城赴杭州的路上，诗人就充满了欣喜，“筋力未全衰，仆马不至弱。又多山水趣，心赏非寂寞……独吟还独啸，此兴殊未恶。假使在城时，终年有何乐。”（《山路偶兴》）到了杭州（诗人三十年前曾来过），诗人充分欣赏西湖的美景，处处充满了发现之乐。在

观赏中诗人不知疲倦：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（《钱塘湖春行》）他看到了以前没有看过的一些新奇景象，不禁要与好友分享这份快乐：“……蜃散云收破楼阁，虹残水照断桥梁……好着丹青图写取，题诗寄与水曹郎。”（《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》）而偶然发现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美景，他会兴奋地提醒同行的友人：“到岸请君回首望，蓬莱宫在海中央。”（《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》）而杭州城的繁盛在诗人笔下也变得特别具有诗意：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水中央。”（《江楼夕望招客》）西湖之美，使得诗人三年任满，不忍离开，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句留是此湖。”（《春题湖上》）“处处回头尽堪恋，就中难别是湖边。”（《西湖留别》）

从杭州回来后，诗人在洛阳做了不长时间的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，于敬宗宝历元年（825）五月诗人又到苏州任刺史。由于身体不太好，因此在苏州没有完成一个任期诗人就于宝历二年十月离开了苏州。虽然时间不太长，但诗人对苏州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诗人与友人同游太湖，留下了“浸月冷波千顷练，苞霜新橘万株金。幸无案牍何妨醉，纵有笙歌不废吟”（《宿湖中》）这些优美而让人神往的诗句。而正因为诗人心情好，所以苏州那一点微妙的春消息也居然被诗人捕捉到了：“黄鹂巷口莺欲语，乌鹄河头冰欲销……借问春风来早晚，只从前日到今朝。”（《正月三日闲行》）在苏州，诗人还养成了赏太湖石的爱好，并搜集了一些石头，为《双石》、《太湖石》等诗的写作提供了素材。

任职苏杭是诗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，多年后，诗人写下了《忆江南》的系列诗篇，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江南之美仍历历在目。而诗人的这段经历，也使得诗人的山水田园诗在唐诗中取得了与王、孟比肩而立的地位。

中隐洛阳：闲适诗时期（827～846）

从苏州回来后，诗人曾有过一段较短时间在长安任秘书监、刑部侍郎的经历。从太和三年（829）三月末诗人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

始，诗人就一直定居在洛阳，再也没有到外面做过官。诗人此后还担任过河南尹、太子少傅等职，会昌二年（842）诗人以刑部尚书致仕。

这段时间，诗人所做的基本上是一些闲散之官，虽然地位尊崇，但基本上没有具体事情可做。这种半官半隐的生活在诗人看来就是“中隐”：“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嚣喧。不如作中隐，隐在留司官。似出复似处，非忙亦非闲。不劳心与力，又免饥与寒。终岁无公事，随月有俸钱。”（《中隐》）诗人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很满意的，不时露出自得之情。他宣称“空山寂静老夫闲”（《香山寺》），既可一个人自得其乐：“幽境与谁同，闲人自来往。”（《小台》）也可与二三知己共饮同醉：“闲征雅令穷经史，醉听清吟胜管弦。更待黄菊家酝熟，共君一醉一陶然。”（《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》）诗人的生活过得悠闲自在。

这个时期诗人的创作数量是惊人的，闲适这一主题占据了这些创作的主体。这一时期诗人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，除了能体现出精神上的自由而不涉自得自满之情的作品外，诗人还创作了一些非闲适的较好作品。如《池上》的“山僧对棋坐，局上竹阴清。映竹无人见，时闻下子声。”就颇具禅意，有王维诗歌的神韵；而《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》则体现出诗人对重大政治题材的一贯关注，并且对自己也有一种批判精神；而《池上寓兴》的“水浅鱼稀白鹭饥”既有哲理的剖析，又有自我写照的意味；《达哉乐天行》体现出诗人的达观个性；《哭刘尚书梦得》（二首）则体现出诗人对好友的怀念，让读者的心灵也为之颤动。

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这一时期诗人创作的好诗还是不少，但好诗占所作诗篇的比重还是大大下降了。白居易是一位高产的诗人，写诗善于驾驭各种题材，并且写诗成癖，但客观上这段时间的作品使其整体质量有所降低，这可能是诗人当初所没有考虑过的。诗人相当多的闲适诗写得格调不高，内容浅显，流于文字游戏，在一些常见的生活琐事（如“发落”、“齿缺”等）中纠缠，这些诗既不能代表诗人的成就，也影响了诗人的声誉。后人论诗对白诗有所微词也多是因为这